

#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彭梓航, 郭剑平

(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法治化能够提高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水平,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提供保障。随着我国法治化速度不断加快,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诸多原因,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在法治化进程中还存在着法律制度不够完备、村级党组织的建设滞后、乡镇政府与自治组织职责不清、基层治理队伍的法律素质不高以及部分群众法治意识淡薄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的法治化水平,我国应当健全法律制度、加强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建设、明确乡镇政府与自治组织的职责、加强基层治理的队伍建设、增强群众法治意识。

**关键词:**基层治理;法治化;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D92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9)03-0082-06

## Study on Problems with Rule of Law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PENG Zihang, GUO Jianping

(School of Law,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6, China)

**Abstract:** The rule of law can improve and guarantee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With acceler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ethnic regions has achieved some good results. But for various reasons, there still exist some problems with current rule of law process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such as incomplete legal system, backward development of village-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confused responsibilities of township governments an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low legal quality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eam, and low rule of law awareness of some peopl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rule of law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China should refine the legal system, strengthen the village-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clarify the respective responsibilities of township governments an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strengthen the building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eam, and raise the rule of law awareness of the masses.

**Keywords:** grassroots governance; rule of law; ethnic minority region

2017年10月18—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我国是一个国土范围广阔的多民族国家,在健全农村基层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要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基层治理体系法治化程度将直接决定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并有利于我党执政地位的稳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新城镇化的建设,我国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面临不少的挑战,比如乡村“空心化”导致治理主体缺位、民族地区人员结构日益分化、不同民

族人民利益诉求多样化、基层社会矛盾复杂化以及宗族与家族势力干扰治理等问题。通过发现问题以及提出对策,来构建法治化的基层治理体系,可以为破解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指明方向。因此,进行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涵和要求

#### (一)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涵

“治理”最初是一个关于“统治”的学问,因时代诉求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主要是指在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公民等多方行为主体依

收稿日期:2019-04-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民事习惯与乡村治理的经验与模式研究(18BFX015);广西师范大学2019年研究生创新项目:少数民族民间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与功能研究——以江华瑶族自治县为例(XYCSW2019022)。

**作者简介:**彭梓航(1995—),男,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理学,法社会学。

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生活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当前,在我国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低层级,范围包括县、城市的区、不设区的市的党组织、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等。<sup>[11][23]</sup>基层治理涵盖群众、民政、文化、社会稳定等各方面的内容,直面治理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基层治理的状况不仅关系到国家政策目标的实现,而且也决定着整个地区治理的效果。基层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首先就要推进基层治理的发展。<sup>[25]</sup>法治是指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法治的基础上,法治化能否有序、稳定、持续的实现,取决于法治的治理效果。

新时代下,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涵就是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前提,通过构建完整的法律框架来管理基层行政区域(包含县级、乡级、村、社区等)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规范治理、有序治理,使基层的各项工作都能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地整体运行。一方面,要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前提。基层治理法治化是一种在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按照人民群众的意志进行,靠党和政府的作用发挥,用法律的权威地位来决定实施的社会活动机制。这是一种制度框架内的实践活动,体现在推行法治化过程中对于地方治理的理论与探索。另一方面,要通过构建完整的法律框架来治理一切基层工作和活动。基层是社会的细胞和基础,基层法治建设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法治化的进程。<sup>[31]</sup>在基层治理体系中,完整的法律框架凭借独特的制度优势与强制规则,制约权力,保障权利,对民主自由的实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二)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

准确理解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涵需要把握以下三个要求。首先,要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sup>[45]</sup>对于基层地区来说,需要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发挥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作用,并作为实践者和示范者为当地的人民群众规范治理架构、厘清职能,建立符合法治要求的

办事决策机制。其次,以培养基层治理队伍为重点。基层治理队伍是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力量,他们的素质、能力、工作思想、工作行为等,就直接反映和代表着基层治理的水平。<sup>[51][16]</sup>基层治理队伍需要与时俱进的法律素质和法律专业人才的支持,才能使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的实践活动得到切实保障。最后,以激发基层社会的活力为目标。伴随着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基层已经成为社会变革与发展变迁的重要领域,对作为基层治理主体的人民群众进行法治教育,能够激发基层社会的活力,提高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能力。

## 二、我国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意义

民族地区是指以少数民族为主聚集生活的地区,在我国主要指民族自治地方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集的区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民族间相互交往、流动而形成了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特点,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北部等边疆地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以来,由于民族地区各具特色的民族习惯传统的存在,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治理方式。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发展对于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实现全国范围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较之过去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基层群众自治正日益走上法治化道路,有关于基层组织建设、基层治理的法律法规不断修订、完善和实施,有效保障了基层群众自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基层社会事务处理和矛盾纠纷解决的过程中更多地运用法治思维。明晰法律的功能价值,落实法治的作用意义,践行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涵和要求,对我国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起到了极大的助推和保障作用。

### (一)法治化能够提高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水平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治理需要全面实现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由此可见,法治化既是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客观要求,又是推进基层治理创新的基本途径。民族地区地处偏远,普法困难,基层治理水平较低,需要依靠法治化来提高治理水平。实现法治化需要发挥法律的规范和惩罚功能,构建完整的法律框架来推进民族地区的基层治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涵要求。法律有规范人们行为的功能,它能够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基

层社会在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时候发挥约束力,进而实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法律的另一个功能是惩罚,国家法律通过强制力来实施,对人民群众有较强的约束力,它可以有效地处理一些违法和不规范的行为方式。法律的规范和惩罚功能可以保障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通过适应社会的需求不断完善法律,维护权利,从而实现治理能力的整体性提升,提升民族地区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 (二)法治化能够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提供保障

法治不仅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和调节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更是基层治理的保障。我国基层治理的法治化进程不断加快,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已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但少数民族地区距离完全实现法治化还有一定距离。法治化能够反映少数民族群众的要求和观点,采取公平中立的方式保障少数民族群众权利,制约公共权力,维护社会稳定。民间法是少数民族群众劳动实践的生活经验的体现,在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一方面,民间法可以起到弥补法律漏洞的作用,从而有利于解决矛盾纠纷的解决;另一方面,民间法与国家法存在冲突的一面,给矛盾纠纷的解决带来挑战。用现代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律的人格塑形功能和秩序调控功能,不仅可以充分发挥民间法的积极作用,更能够保障少数民族群众法治观念生成和法律人格塑造。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机关在法治化进程中依法管理本地方民族事务,保障基层治理更加科学化、规范化,保障公共权力的实施更加有序、稳定、可持续。

## 三、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法治化程度直接反映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果丰硕,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工作已见成效,已经形成以宪法与民族自治法为中枢,以各个自治地方自治法律法规为辅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但是与其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目标新要求相比,还是存在一些差距的。<sup>[6]36</sup>目前,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存在如下一些问题及成因。

### (一)法律制度不够完备

有法可依是法治的前提,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现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作为支撑。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条规定:“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的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

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二条、七十五条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及地方性法规,可以对我国法律作出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拥有比非民族自治地方更大的立法权限。在现实中,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基本上能够自觉有效地行使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民族性和自治性体现较为充分。但是也存在着法律制度不够完备的问题:第一,从内容上看,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民族特色不够。国家赋予民族自治地方一定的立法权,原因就在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民族地区有自己独特的民俗习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理环境等情况,比其他地区复杂特殊,制定法律或者创新制度需要反映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传统生活习惯和特征,难度较大。第二,从制定的周期上看,民族地区的地方性法规制定周期较长,滞后于现实需求。比如,一些地区为了保护民族传统村落而制定相关村落护条例,从开展调研到最后出台需要几年的时间,就是因为起草、审查、公布等环节过多,每一个环节中都需要经历一定的程序和花费相应的时间,严重滞后了民族地区事务的管理,也打击了民族地区法律制定的积极性。<sup>[7]</sup>

### (二)村级党组织的建设滞后

村级党组织在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推进各种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实施。伴随法治社会和农村改革的深化,现行村级党组织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中的问题开始日益显现,特别是部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滞后、难以承担重任,<sup>[8]18</sup>具体表现为:第一,班子建设方面。村级干部工资待遇偏低,奖金报酬不能及时兑现,物质基础无保障。例如,位于云南西部的大理白族自治州,现行村干部补贴在每人每月1 750至1 900元之间,甚至低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村官每月2 100元的工资。<sup>[9]168</sup>第二,党员队伍建设方面。在当前人员流动性较大的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群众优先选择外出就业。基层的文化精英通过升学渠道外出读书就业,部分经济精英通过打工或经营渠道流入城市,只有少数政治精英存在于基层党员队伍中,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发展空间不足。第三,党组织活动开展方面。基层治理中参与法治化工作的各方负责人责任和任务不明确,村级党组织工作的整合力度不足,导致党组织活动开展的凝聚力不足。



### (三)民族地区的乡镇政府与自治组织职责不清

我国民族地区区域广阔,村民自治的人口众多,少数民族群众在地方治理事务决策中的参与度和积极性较强,需要民族地区的乡镇政府与自治组织共同发挥作用,对村民权益进行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指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厘清了村委会等自治组织在村民自治中的职责范围,规定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是指导、支持、帮助的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于民族自治地方来说,乡镇政府在村民自治范围内指导、支持、帮助村委会的工作,村委会对乡镇政府的治理活动进行协助、配合。民族地区非常注重个体家庭与家族的关系,在政府管理下,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和聚居情况也需要村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加以管理。但在现实中,却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某些民族地区的乡镇政府在人事安排上越位侵权现象严重,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调整、撤换民选村干部,操纵村民选举,过于行政化,忽视民族因素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比如,部分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提出“好干部”的人选,通过召开村民大会进行选举,表面上看来遵守了选举规定,但实际却是政府主导下的村干部选拔模式。<sup>[10]72</sup>另一方面,某些民族地区的乡镇政府会把村民委员会当作派出机构,对村委会下达超出职权范围的行政命令,不利于村委会的职责发挥,损害了少数民族群众对于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和聚居情况的民主决策权。一些乡镇政府为了发展本镇经济,用行政命令要求村民种植某一种作物,严重剥夺了村民自治权。<sup>[11]</sup>

### (四)基层治理队伍的法律素质不高

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就要求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必须配备法律人才,才能形成一支专业的基层治理队伍,使民族地区的实践活动得到切实保障,将法治化进程稳步推进。但是,当前的基层治理队伍的法律素质不高,工作人员缺乏法治思维,习惯依照惯例和传统方式解决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的矛盾和纠纷,对法律、法规的内容和作用了解较少,依法办事意识不强。有些地方因公民(包括各级领导干部)欠缺法律素质而引发社会矛盾,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造成部分群众上访不断。<sup>[12]</sup>究其原因,一方

面,受到人为干扰因素的影响。基层社会是熟人社会,领导干部的个人价值选择和社会关系效应都会使治理工作产生偏差,背离法治行为方式,加上缺少有效的学习培训机制,领导干部所掌握的法律知识难免单一陈旧,综合素质不高,业务能力不强,难以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需要。另一方面,法律专业人才流失现象严重。人才资源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基层工作待遇差,工作压力大,基础设施不完善,各种保障体系不健全,法律专业人才不愿长期留在民族地区基层工作,辞职率较高。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人才支撑,阻碍了法治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 (五)部分群众法治意识淡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性、基础性工作来对待,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法治宣传教育。这一要求,显示了全民普法和守法与依法治国的工作推进是密不可分的。普法是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和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的必然选择。<sup>[13]137</sup>但在我国民族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对法治的认识非常抽象,没有真正学习过法律,在实际工作中无法正确和自觉遵守法律。如在青海民族地区进行的“法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是否重要”的问卷调查中,认为法律在日常生活中不重要的人高达52.8%,只有27.4%的人承认法律的重要性,由此调查问题及回答情况数据整合分析显示,法律在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地位并不重要。<sup>[14]</sup>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在矛盾和纠纷的解决时,更依赖于在当地具有很高权威性的村委会,用民间法或习俗习惯等方式来处理纠纷,存在民间法、习俗习惯与国家法冲突的现象,法治意识有待提高。

## 四、进一步推进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建议

我国坚持不懈推进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其目的是为了建立和谐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大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充分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针对上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中存在的问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 (一)健全法律制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所以,在

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大背景下,健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是少数民族群众立法诉求的体现,是对其权力和利益的保障。第一,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配套法规,将相关规定具体化,使之得以落实。第二,补充和完善具有民族特色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及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及地方性法规紧密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与需要,把表达地方特色、民族印记和少数民族群众利益要求的条款补充到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第三,在立法比较滞后的情况下,合理运用政策性手段处理基层问题。政策手段不同于法律、法规,制定和发布周期较短,可以及时有效地处理民族地区在基层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在政策成熟以后,将其及时上升为法律。

## (二)加强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建设

民族地区的村级党组织是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加快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进程,就要加强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建设。明确目标、要求、措施和程序,切实强化对村级党组织的管理、激励和约束机制,使村级党组织发挥好在推进民族地区基层法治化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以此来健全民族地区的基层法治工作体系。第一,强化物质保障,如提高福利待遇和工作津贴,给足村级党组织活动经费。第二,进行党员队伍的法治培训,培养法治思想和法律素养,全面提高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能力和水平。第三,实行分工负责制度。明确各方负责人权利义务,建立组织领导体系以及严格考核奖惩制度,从制度上保障基层党组织活动的正常开展,落实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

## (三)明确民族地区的乡镇政府与自治组织的职责

加快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进程,就要明确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等自治组织的职责。首先,厘清乡镇政府和自治组织的关系。民族地区的乡镇政府是基层治理工作的责任主体,向下传达并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自治组织是群众性自治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积极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状态。民族地区的乡镇政府和自治组织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不是隶属关系。其次,民族地区的乡镇政府必须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加强对村委会有关民主决策、社会稳定的管理;村委会要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进行村民自治,不得随意增加村民的非法定义务,违法限制村民的自由权利,充分考虑民族因素,考虑少数民族群众的聚居情况。最后,完善严格的监督制

度,来监督基层法治化工作,设立追责、处罚制度,对村民自治中出现的操纵村民选举行为进行追责并严格处罚。

## (四)加强基层治理的队伍建设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党组织和政府发挥带头作用,更需要一支由法律专业人才组成的高素质治理队伍。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占据人才的制高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为了践行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需要加强基层治理的队伍建设。第一,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与法定程序而不是领导干部的个人意志处理问题,在基层治理内部杜绝官僚主义作风。以法律为准绳,克服“人治”固定套路带来的弊端。第二,营造良好的基层工作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健全就业保障体系,防止人才流失。第三,制定符合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人才引进政策,引进高质量法律专业人才。

## (五)增强群众法治意识

为了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激发基层社会活力,我们要在民族地区培育基层社会法治文化。全面深化法治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基层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法治观念,以增强普法宣传的实用性和现实针对性为切入点,通过发放手册、张贴海报、开设法治讲堂等形式教育引导民族地区基层群众依法维护自己利益,使用合法的方式保障权益,形成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法治化氛围。普法工作应做到三个结合:第一,法治宣传与普及知识相结合。采取灵活多样且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少数民族群众传授法律知识,如建设法治文化广场、法治文化墙、法治文化专栏等,用法治知识和文化氛围对基层群众熏陶和教育,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第二,法治宣传与加强司法队伍建设相结合。加强民族地区基层的司法所、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充实当地法治专业队伍,推进法律援助实施,增设法律顾问岗位,组织司法工作人员和法治干部深入基层、村组、农户,一对一援助少数民族群众,为少数民族群众剖析身边的典型案例。第三,法治宣传与降低用法成本相结合。降低诉讼费用,着力解决好少数民族群众打官司难的问题,使他们在处理生活中的矛盾、纠纷时能够自觉用法。

## 五、结语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法治化问题,不仅关系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还影响着各族人民能否实现团结,社会能否和谐发展。当前,我国

的基层治理已进入到关键时期,要充分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然要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发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用法治化

为基层治理保驾护航。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有效开展,才能构建法治化的基层治理体系,从而为破解民族地区基层治理遇到的困难指明方向。

#### 参考文献:

- [1] 王乐夫.中国基层纵横含义与基层管理制度类型浅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122-127.
- [2] 王雅琴.民族自治地方的基层治理[J].晋中学院学报,2016(2):52-55.
- [3] 李咏玲.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问题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7(1):17-18.
- [4] 秦锁英,魏欣.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助推基层治理法治化[J].江南论坛,2019(1):53-54.
- [5] 赵喜平.谈如何进一步深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J].法制博览,2018(32):116-117.
- [6] 韩阳.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研究[D].大理:大理大学,2018.
- [7] 谭理懿.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县法治建设研究——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例[D].武汉:武汉大学,2017.
- [8] 邱春林.农村治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J].中国国情国力,2015(4):18-19.
- [9] 张倩倩.民族地区村级班子建设:成效.问题.对策——以云南省大理州为例[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6(4):166-171.
- [10] 陈代吉.贫困民族村庄村民自治:影响因素与村委会选举——以A村为个案[J].世纪桥,2017(11):71-72.
- [11] 黄荣幸.基层治理法治化视野下民族地区法治村屯建设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7.
- [12] 张帆.我国多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法治化建设研究——以贵州省为例[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3.
- [13] 陈蒙,雷振扬.民族地区普法的价值分析与路径选择[J].青海社会科学,2017(5):135-140.
- [14] 张立群.社会转型时期青海民族地区法治建设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6.

(上接第59页)

- [4] 高飞,向德平.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可能性与可及性[J].社会工作,2016(3):17-24,124.
- [5] 杨荣.论我国城市贫困治理中的社会工作[J].新视野,2008(3):35-37.
- [6] 向德平,姚霞.社会工作介入我国反贫困实践的空间与途径[J].教学与研究,2009(6):22-26.
- [7] 李迎生,徐向文.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功能定位与实践探索[J].学海,2016(4):114-123.
- [8] 王思斌.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参与——兼论实践型精准扶贫[J].社会工作,2016(3):3-9,123.
- [9] 刘春怡.论农村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之融合[J].长白学刊,2017(3):134-138.
- [10] 金昱彤.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从救助个案到改变系统[J].甘肃社会科学,2017(6):165-170.
- [11] 林顺利,孟亚男.嵌入与脱嵌: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J].甘肃社会科学,2018(3):9-15.
- [12] 陈辉.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7(3):100-104.
- [13] 袁君刚.社会工作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比较优势探索[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1):17-22.
- [14] 宁波出台《关于加强专职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EB/OL].[http://www.zj.xinhuanet.com/2018-06/25/c\\_1123030814.htm](http://www.zj.xinhuanet.com/2018-06/25/c_1123030814.htm).
- [15] 宿迁市出台《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实施意见》[EB/OL].<http://www.suxinwen.cn/news/759737>.
- [16] 甘肃三区项目培养本土化人才队伍[EB/OL].<http://www.cpwnews.com/content-24-21992-1.html>
- [17] 李光杰,姬升峰.省市联动,创制度、建项目、搭平台共反贫困——山东省社会工作力量参与脱贫攻坚调研报告[J].中国社会工作,2018(28):35-37.
- [18] 徐选国,杨絮.农村社区发展、社会工作介入与整合性治理——兼论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范式转向[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5):8-17.
- [19] 李立国.我国专业社工近50万名[C].人民日报,2016-03-16(04)。
- [20] 秦永超.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出路[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6):125-128.